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主办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河南大学出版社

2
2008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3

第 1 卷(第 2 期)

河南大学出版社

• 开封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第1卷(第2期)/苗长虹主编.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81091-933-3

I. 黄…⁵ II. 苗… III. ①黄河流域—文化史—丛刊②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丛刊 IV. K292—55 X2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0625 号

责任编辑 董庆超

责任校对 千里草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302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2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顾问：李学勤 冯骥才 陆大道 孙九林 牛文元
陈栋生 王 巍 马润潮(美) 李福清(俄)
戴福士(美) 吉尾宽(日)

主编：苗长虹

副主编：覃成林 高有鹏 牛建强 刘东勋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方创琳	王蕴智	孙一飞(美)	许学工	刘彦随
李小建	李玉洁	李振宏	张大新	张云鹏
张新斌	杨云彦	杨伟聪(新)	杨朝明	侯甬坚
耿明斋	晁福林	秦耀辰	康保成	程民生
樊 杰	魏也华(美)		魏后凯	戴松成

执行编辑：李谢辉

主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
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目 录

专论

- 黄河农耕文明辉煌和衰落的制度性和经济性原因分析…………… 宋丙涛(1)

经济与社会

- 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构建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新格局…………… 陈栋生(34)
- 经济全球化、自生能力与中部地区崛起战略 …………… 苗长虹(48)
- 迁移预期、社会支持与能力建设——基于丹江口库区待迁移民的调查分析
…………… 杨云彦 程广帅(60)
-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协调发展区域研究——以山东、河南两省为例
…………… 李玉江 邱加萍(71)
-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黄河沿岸地区农耕经济的结构变迁…………… 李 恒(89)
- 山东经济空间分异型式及其成因研究…………… 覃成林 吕化霞(103)
- 河南省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检验——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的综合考察
…………… 刘东勋(117)

地理与生态

- 黄河流域管理与协调发展研究…………… 安树伟 张 晓(126)
- 打造沿黄省区强势高科技农业和生态系统的思考…………… 杨承谕(148)
- 自然保护区的合作与网络联系——以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 许学工(160)
- 黄河流域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研究与实践…………… 秦耀辰 秦 奋 李 爽(168)
- 中原城市群城市生态安全评价与生态建设研究…………… 曹新向(181)

学术信息

- 河南大学举办第七届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国际会议…………… (193)
- 河南大学成功举办“中原城市群科学发展”论坛…………… (195)
- 征稿简则…………… (197)

黄河农耕文明辉煌和衰落的制度性 和经济性原因分析^{*}

宋丙涛

摘要:东西方文明比较曾经引起了社会科学家们的普遍关注,但并没有引起经济学界的足够重视。传统文化的回归在东亚大陆激起了层层涟漪,却没人能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及其与现代文明的关系进行分析。本文从公共经济制度变迁的角度,考察了整个农耕文明演变的历史。本文的结论表明,农耕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公共经济制度变迁的第一次飞跃,而以文官官僚体制为特色的黄河文明则是其中最为有效的创新与尝试。

关键词:黄河文明;公共经济;制度变迁

作者简介:宋丙涛(1965~),男,河南辉县人,博士,副教授,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为公共财政运行机制、经济发展理论和产业革命史。(河南 开封 475001)

一、问题的提出:文明冲突还是制度变迁

近二十年来,由于冷战的结束与意识形态对抗的消退,国际上各文明之间,特别是现代的工业文明与传统的古老文明之间的关系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对文明比较的升温首先是从文明的冲突讨论开始的。无论亨廷顿的判断是否符合现实,但他所提出的话题引起的巨大反响肯定了他《文明的冲突》中文版序言中所作的判断,即“人们正在寻求并迫切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

当然,正是由于缺乏这样一个新的国际政治单位与分析对比框架,因此尽管德国学者

^{*} 本研究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黄河下游农区工业化与社会转型路径研究”(06JJD770009)的阶段性成果受到了教育部基地研究基金的资助,特此致谢。

米勒^①一再强调文明的共存特征,反对亨廷顿仍把宗教文化作为国际政治关系的基础,尽管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在国际政治斗争过程中仍是那么的鲜明与突出,但以文明对垒与文明冲突为主题进行分析讨论的学者仍然大有人在^{②③}。这些学者不仅从文明的演变历史中寻找文明冲突的理论基础,而且强调了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不相容性;他们不仅把东西方的冲突定义为文明或文化的冲突,把西方文明等同于基督教文明,而且对于已经在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上获得成功的德国、日本与东亚地区的经验^④视而不见。有的学者甚至预言,在新文明或现代化的过程中“人类各大文明”“再也难以走向实质性的整合”,并指出“西方化的道路并不能解决自己国家和地区的根本问题”^⑤,坚信自己能够选择一条与西方不同的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现代化道路。至于新的现代文明的本质是什么、起源于西方的现代化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究竟有没有关系却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只是把基督教文明视为与西方现代化成功必然相关的西方文明,并强调“从此以后文明的基本单位就不再像神话时代和英雄时代那样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以信奉共同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作为精神纽带而被连接在一起的文化联合体”^⑥。似乎在已发展到全球化时代的21世纪人类之间的冲突主要不是利益的冲突,而仍然是以神学体系为基础的精神向往的冲突;似乎人类文明不能在纵向的升级变迁中相互融合,而只能在横向的对比冲突中消亡自己。

其实,即使不说各大精神或宗教体系的核心内容都是一样的,我们也应该知道作为人类解决人与人之间、人与外界之间关系的重要哲学体系,文明的内涵与级次肯定是在不断地发生着升级变迁的变化的,它们不可能总在同一个级次上进行着无休止的比较与冲突。尽管作为已经进入宗教体系的个人来说很难改弦更张笃信新说,但作为人类的圣贤睿智的哲学家们肯定清楚,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对以网络为信息渠道的日益全球化的形式,一种更能在全球传播交流的哲学体系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相互包容的精神体系必然会取代旧的相互冲突的宗教伦理体系,而不能在这些不同时代的文明之间作出区分肯定会令人产生误解。正如赵林教授所说,“人们把数千年前的文明和现代的文明看做同一种文明”其实是一种误解,“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在于,在近代历史角逐中败下阵来的非西方文明为了保持一种心理平衡,因而试图用昔日的光荣来掩饰当下的窘迫”^⑦。

当然,试图掩盖窘迫的并不只是早已日落西山的古代文明发源地,作为现代文明发源地的欧美各国学者同样在有意无意地误导听众,掩盖自己的窘迫,寻求心理平衡。比如像亨廷顿、韦伯这样一些西方学者在今天仍把文明冲突作为主题来进行讨论,或仍把基督教

① 哈拉德·米勒:《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

②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

③ 赵林:《告别洪荒——人类文明的演变》。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④ 哈拉德·米勒:《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

⑤ 赵林:《告别洪荒——人类文明的演变》。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⑥ 赵林:《告别洪荒——人类文明的演变》。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⑦ 赵林:《告别洪荒——人类文明的演变》。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

文明等同于现代文明或工业文明,就是这样一种明显的误导。因为现代的工业文明早已是一种典型的世俗文化,是一种典型的经济文明,其核心是市场经济制度与宪政基础上的公共经济制度。西方学者把西方文明等同于基督教文明来与伊斯兰教文明、儒教文明相提并论首先是为了掩盖窘迫的历史,追求心理平衡。第一,他们试图用现代文明的成功来掩盖基督教文明在农耕文明时期的失败。因为作为一个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基督教无论是和中国的帝国官僚体制比较,还是和伊斯兰教的政教一体的帝国体制相比,都是非常失败的,不仅解决不了国防,也解决不了内政。有这样一段失败历史的以基督教文化为精神根基的西方“优等”民族,总是让人不够理直气壮。第二,也可能有意,也可能无心,西方人没有把现代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区别开来,从而使现代西方文明有了历史,有了传承,有了在人类历史上可以骄傲的资本,特别是借此还能与希腊、罗马文明攀上血缘关系,从而把自己的成功通过和中东、地中海闪族文明的联系归结为人种的优劣。只不过令人失望的是,现代西方文明,或源于英国的工业文明,其实是落后的原始军事贵族文化与市场经济嫁接的结果,既与基督教文明没有太大的文化关系,也与希腊、罗马文明没有紧密的血缘纽带^①。当然,这样窘迫的历史并不能掩盖住现代文明的光芒,因此西方的学者本没有必要去攀一个远亲,更没必要把自己近代奋斗的崛起史归结为别人祖先的优秀。

其实,人类文明的变迁历史就是一部利益关系冲突调解方法改进的历史,就是一部公共经济制度变迁的历史,尽管宗教伦理体系曾经是一种比较有效的组织方式与解决办法,尽管国家并不是最终的最佳方案,然而,就我们近代以来所看到的历史来说,国家已日益取代了宗教成为基本的国际政治单位或公共经济单位。近代以来,世界上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以宗教为单位、以教义为目的的战争,相反,大多数战争是在同一个宗教文化体系内部进行的。不论是两次世界大战,还是日俄之间、中日之间、两伊之间的战争,其实质都是国家利益之争,都是国家之间的公共经济制度垄断地位之间的竞争,因为国家才是现代公共经济的基本单位,国家政府才是公共经济行为的主体。因此把宗教时代与工业时代混在一起,既可能是某些西方学者的无知,也可能是这些学者有意欺骗非西方国家的伎俩。其目的是让我们在传统的精神领域中去和那些早已退居山野乡林的基督教文化相竞争,而他们却在世俗的世界里、在公共经济制度改进的道路上大步前进!因此非西方学者的如下强调似乎恰好中了他们的圈套:“由于这些互异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影响,各大文明体系开始越来越明显地分道扬镳,他们之间的殊异性因素日益超越了他们之间的共同性因素。”^②

然而,如果去掉利益的冲突,去掉那些领袖人物因个人私利而有意误导的成分,这些文明体系的真正差别又是什么呢?人类活动追求的目标难道不都是现世的经济利益?人类文明的变迁难道不正是利益冲突解决办法的改进?现代文明不正是一种新的制度体系与解决办法?如果知道了这一点,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把最新的、最好的解决方案引进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我们为什么要抱住自己早已被证明在新条件下是不成功的旧体系旧办法不放呢?其实,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已经表明,国家、宗教与意识形态都曾经是或仍然

① 宋丙涛:《财政制度变迁与现代经济发展》。河南大学研究生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② 赵林:《告别洪荒——人类文明的演变》。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

是一个重要的基本经济单位^{①②③④},并且作为人类文明内涵的公共经济制度很有可能成为市场机制之外新的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但在新的文明比较研究中,不仅传统的市场经济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与雅利安民族优越论日益趋向边缘化^{⑤⑥},以亨廷顿为代表的学者开始隐约透漏出一丝悲观主义情绪,而且在经济学史界甚至还出现一股矫枉过正的修正主义思潮^⑦,试图否定西方文明制度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先进性。

另外,在当前的对比中处于劣势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也总是喜欢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寻找自尊与自信心。因此,当中国、印度等东亚、南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开始崛起时,它们不愿也不可能将自身的崛起归结为“东方的欧洲人”特征,于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目光聚焦在古代文明与国学传统的开发上,试图否定西方文明先进性的思潮也开始出现。西方文明与中国本土的传统文明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中国是否应该或是否有必要进行全面的制度改革?这些曾持续了一百多年的讨论也再次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尽管大多数人都接受了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共识,中国也在搁置争论、边走边看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初步成功,但这些现代化过程中的初步成绩也使压抑了一百多年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自信急于通过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国学回归^⑧表现出来,而在经济急剧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利益矛盾也想借助于传统文化精神与价值观念来予以缓解,于是传统文明优劣的争论^⑨就与赤裸裸的民族主义宣泄^⑩一起迸发出来。然而,在全球化、现代化与世俗化发展早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追求目标的今天,仍然把传统文明对比而不是新文明的创造作为自己的关注焦点无疑会阻碍我们的现代化步伐,使我们像两千年来那样在传统文明的、低层次的竞争陷阱中循环往复,不能自拔,以至于最后和竞争对手一起被历史所抛弃^⑪。特别是在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警惕早已成为国际政治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原则的今天,在中国日益成为一个经济上、政治上与军事上的大国的21世纪,我们过分强调传统文化回归与直白的民族主义精神的宣泄很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内部摩擦与外部疑虑。

① 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②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③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④ Olson, Mancur;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⑤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⑥ 摩尔根,亨利·路易斯:《古代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

⑦ Pomeranz, Kenneth;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⑧ 主要表现为传统文化丛书的火爆、《论语》现象与国学大讲堂的建立。

⑨ 赵林:《告别洪荒——人类文明的演变》。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⑩ 其典型表现是娱乐明星对黑头发、黄皮肤的歌颂及其在东亚听众中引起的强烈共鸣。

⑪ 在现代市场营销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将市场竞争的目标定位在为消费者解决问题而不是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否则当行外的竞争对手用一种全新的办法解决了消费者的问题时,关注产品质量竞争的双方都会同时被市场所抛弃。盒式录音带与照相胶片工业的衰落就是典型的例子。

因此,用一个以效率为基础的公共经济制度变迁理论对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历史贡献分别进行客观的评价,并对它们产生、存在与变迁的经济合理性与内在逻辑性作出分析就是非常必要的。它不仅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而且有利于我们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对以黄河文明为代表的传统文明与以英国工业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文明之间优劣进行对比,从而对中国的现代化与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文化创新与文明变迁工作的促进提供一定的帮助。

二、公共经济活动中的专业化分工与集权专制的农耕文明的产生

众所周知,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早已表明,人类社会在经济效率方面的进步是由不断累积的劳动分工带来的。但传统的人类社会发展常识却只是强调生产过程中农业与畜牧业、手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分工带来的技术进步,而对意义更为重大、影响更为深远的人类社会大分工——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生产两大类型经济活动之间的分工却重视不够,很少有所论及。实际上,沿着从大到小、从宏观到微观的逻辑顺序,首先出现的社会大分工就是专业化公共经济活动的出现,即公共产品的生产从部落集体经济活动中分离出来并成为社会组织出现的经济基础。

其实,考古学家与人类文化学专家一再表明,在文明出现以前的人类社会早期,经济活动首先表现为产权无法界定的公共经济活动,人类社会的文明前历史首先是一部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不加区分的部落社团经济的发展历史^①。只有那些最先在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间实行了专业化社会大分工的部落才出现了人类最早期的文明形态,更为准确地说,是那些少数人首先从集体性生产劳动中退出来专门从事公共经济活动的部落最先出现了文明的曙光,并以社会组织结构残骸的形式保留下来。美国学者摩尔根先生对北美印第安人的考察、对希腊与罗马部落社会的考证,河南大学学者张振犁先生^②对中国中原神话内涵的考究都表明,在文明出现以前的人类社会中,生存是文明前人类经济活动的主要目标,而产权不分的社团部落集体经济活动是那时人类唯一的经济活动形式。而社会组织的出现,特别是考古学家发现的9000年前出现在地中海沿岸的巴勒斯坦村社遗址、5000年前出现在中国中部的二里头古城遗址以及3000年前出现的安阳殷墟遗址与甲骨文,反复表明这些为社会分工服务的社会组织的建立与改进正是公共经济活动脱离集体经济活动而成为专业化分工与效率提高的体现,是人类文明出现的基础。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与社会大分工相一致的公共经济体制大多是以神话(迷信)欺骗与恐吓为手段的准自愿交换的部落推举式半民主半强制的政治体制,而私人经济活动则仅表现为统治者及其家庭占有的战利品,大多数社会成员在早期是没有私人经济活动的。在文明形成与变迁的过程中,为了尽量减少公共经济提供与社会分工中的交易成本,提高公共经济活动的效率,不同时空领域的成功的政治家与圣贤哲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想到了

^① 宋丙涛:《关于公共财政与市场经济关系的思考》。《湖北财税》,2001(5)。

^② 张振犁,陈江风:《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

这同一个手段,即借助世俗社会的武力强制与神话世界的精神强制来实现分工的顺利进行与持续发展。于是在今天的全球,人类考古可以发现的人类文明的遗迹无不表现为两类财富的堆积:统治者或公共产品提供者的生前死后的建筑物与用品,用于和神灵世界交流的各种庙宇设施与宗教学说。正是为了维护这种分工,为了完成这些公共经济活动所需要的物质与文化事业,人类社会才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在这些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很少能看到纯粹是为了市场、或是为了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进行的技术改造。

虽然除了北美的印第安人与太平洋岛屿的原始部落之外,我们很少有直接的文献资料来确定人类的文明前历史,但许多民族都保留下来的较为完整的系统的神话传说给我们传递了许多史前文化的信息^①。由于神话传说生动地折射出了史前文化部族发展的历史,是原始人日常生活经验事实的反映,主宰一切的神灵明显带有人类部落首领的特定性格,因此用神话来研究史前人类的思想与历史发展本身就是一门科学^②。正如美国学者戴维·利明^③所说,“许多神话事件显然是以历史为依据的”,因此“一般地说,神话的确有助于人们解释古人的习俗、信仰、制度”。而无论是纷繁复杂的中原神话传说,还是光辉灿烂的希腊神话体系,它们的内容无一不在向我们展示一幅原始部落集体经济向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公共经济过渡的图景,民族英雄、神圣巫师与部落首领的丰功伟绩无一不是与部落生存这个公共经济活动目标密切相关的,而这些史前人物在公共经济活动方面的专业化水平又无不是与该民族后来的繁荣与在文明诞生中的贡献息息相关的。因此,与北美印第安人仍在部落联盟中寻求发展相比^④,中原神话中的炎黄伏羲折射出华夏领袖的权威与定制功勋、希腊神话中宙斯万神体系反映出的雅典先人的秩序功能必然为人类文明的诞生奠定了公共经济制度发展与效率提升的基础。然而,人类文明诞生过程中的这些公共经济制度发展的贡献却一直没有得到经济学家们应有的研究与理解。

当然,社会大分工带来的专业化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社会文化水平与科技发展水平,并体现为劳动工具改进与劳动生产力的迅速提高,这些技术的进步又进一步使大多数人的私人经济独立分离出来成为可能。科学技术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还使农业的收成很快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于是农业与畜牧业的分离才逐渐有了可能,而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又进一步使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成为现实。于是不同地区的农业文明古国相继出现,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经营成为私人经济的主要内容,以军事武力强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帝国财政体制成为农业文明中主要的公共产品供给形式。

实际上,尽管人类文明的起步正是来源于它在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之间进行的社会劳动大分工,然而也正是这个分工使公共经济活动效率的进一步提高遇到了难以逾越的

① 张振犁,陈江风:《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

②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

③ 利明·戴维:《神话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④ 摩尔根,亨利·路易斯:《古代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

障碍。公共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表明^{①②},专业化分工基础之上的公共经济效率的提高大体上依赖以下几个机制的健全:第一是需求偏好整合与代理机制;第二是偏好显示与供求双方讨价还价机制;第三是执行主权强制与付费者或消费者事后监督机制。在这些机制中,最后一个机制是问题的关键也是悖论的源泉。因为这个机制中的两方面恰恰是相互对立的,给了执行者以强制力,需求者就会坐以待毙;不给执行者强制力,公共经济活动的执行就会大打折扣。当然,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需求内涵的单一,偏好显示与事后监督的重要性一直较弱,当外来竞争压力与内部协调矛盾急剧上升时,世界各地的许多民族都不约而同地用强制机制与手段代替了原始社会民主的偏好显示机制,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也推动了农耕文明的出现。

确实,公共经济效率提高主要依赖于收入强制与供给执行的能力,曾经在原始部落的公共经济民主制度中发挥过作用的偏好显示与执行监督机制在部落相互之间的征战与竞争中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并且,在这个追求人类生存的过程中,集权专制的种群生存体系要远胜过分权封建的家庭生存经济体系,并表现为人口的大量增长。由于专制减少了财政活动中的内部协调成本,提高了公共品供给方面的执行效率,集权的农耕文明不仅使其种群中能生存下来的人口急剧扩张,而且使种群内部的社会分工得到充分的扩展,经济效率大大提高。虽然个人的自由与人均的福利未能大幅度提升,但人类的生存目标却得以实现,并在保证人口增长的同时还能有余力修建大量的人文工程(战争工程、神庙工程与等级象征工程),并成为人类文明的见证。

那么为何有些地方成功地发展出了集权专制的农耕文明,有些地方在分崩离析的内部争斗中趋于消失了呢?答案当然不可能在于孟德斯鸠(1748)所鼓吹的决定种族特征的地理环境,而在于决定制度演化方向的社会囚笼(social caging)效应。社会学家曼恩认为是自然地理环境带来的社会囚笼效应决定着一个民族是否能在早期的竞争中尽快实现有效率的专制集权统治,并获得农耕文明的成功^{③④}。由于东亚大陆特殊的地理环境^⑤,囚笼效应使中国人像古埃及人一样较早地用神话强制或军事强制建立了有利于种群生存的

① 宋丙涛:《财政制度变迁与现代经济发展》。河南大学研究生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② Song Bingtao, Zhangxin: A Theory of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Economy. Hongkong: AC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07.

③ 宋丙涛:《财政制度变迁与现代经济发展》。河南大学研究生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④ Mann, Michael: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ume I,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 D. 176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⑤ 如下页图1所示,欧亚大陆上的六大古代文明都依赖于自然环境提供的社会囚笼,即在生存竞争中战败的一方不可能寻求新的生存环境,而只能在屈服与灭亡之间进行选择。在这六个古代文明中,罗马、希腊与中东周围的自然屏障主要标志为地中海与原始森林,但这些屏障在铁器技术与航运技术的改进中很快消失,因此它们的集权专制帝国在公元元年之后很难再长期维持下去。埃及、印度与黄河文明则一直持续到外来工业文明的影响。特别是黄河文明,由于东南面的太平洋、西南面的喜马拉雅山与北面的戈壁沙漠不仅形成最为坚固的社会囚笼,而且提高了与其他文明交流的成本,阻隔了与其他文明交流的机会,因此黄河文明在中世纪到来前的一千多年中已经完全演化出来最为科学的专制政体与官僚机构相结合的公共经济制度,从而确保了黄河文明虽然在后来一再受到野蛮民族的冲击却始终能保持农耕文明的内核不受影响,并使黄河文明成为唯一没有中断的古代文明。

专制政体,并使黄河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实现的农耕文明的具体体现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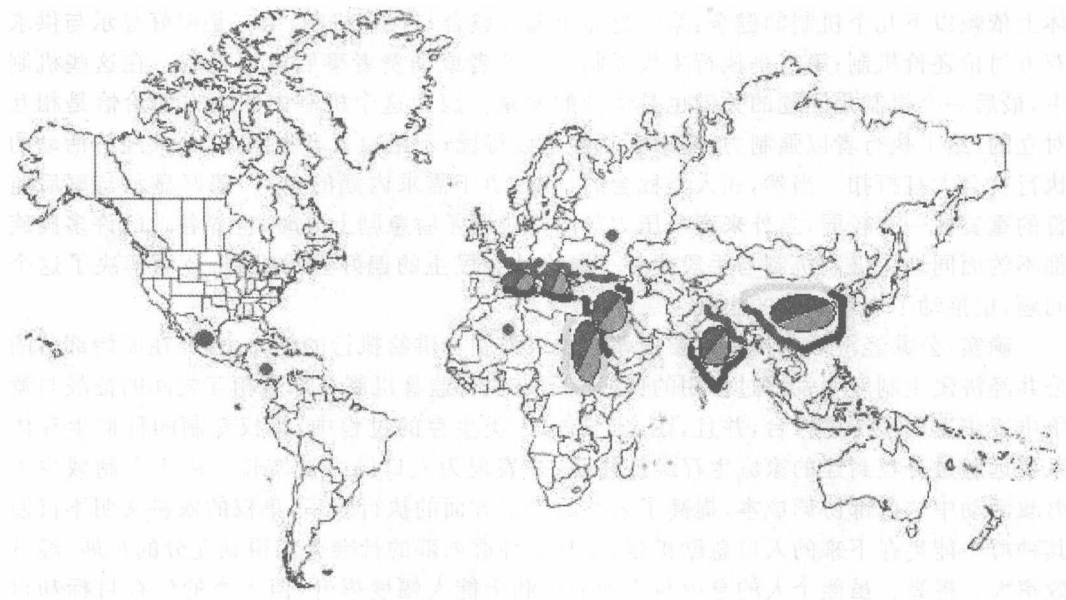


图1 专制政体与农耕文明出现过程中的囚笼效应

三、文明本质、普世文明与文明比较的经济制度内涵

尽管人类的历史一再表明,公共经济效率的提高,特别是强制性权威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诞生的前提,但在部分西方学者的概念体系中,文明似乎只是欧洲文明或工业文明的代名词,并且文明似乎是法国思想家在18世纪提出来这个概念之后才存在的。事实上,无论是作为一种意识、一种理论或一种现实,文明与野蛮的对比,即使不考虑更早的埃及文明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在希腊、罗马时期之前的中国,至少是在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存在了。因为正如亨廷顿(2002)^①所说,人类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文明的历史,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思路来思考人类的发展。

但文明的本质是什么,隐藏在彬彬有礼的文明礼仪背后的、隐藏在金戈铁马的战争与腥风血雨的统治背后人类追求的又是什么呢?

从20世纪早期以来,受冷战思维与意识形态竞争的影响,对于希腊是否是第一个人类文明以及希腊文明是否近代文明的先驱,几乎所有的学者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②③}。因为在许多学者的脑海里,似乎只有民主才是文明的内涵与本质,任何其他政治形式,特别是独断专制的君主制不可能是文明的起源,不可能是文明的表现形式之一。但对于已经有了民主政体的希腊与罗马为何会不约而同地转向专制的贵族寡头统治,他们却无

①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

② 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③ 易中天:《帝国的终结: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批判》。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法回答,历史学家只能无奈地归之于人性的堕落与历史的倒退。只有头脑清晰的历史学家西塞罗对这种倒退进行了赞扬,并清楚地看到了古希腊、古罗马民主政体的落后与无效^①。近年来历史学家也逐渐认识到,希腊人与罗马人不仅不是文明的先驱,实际上是文明的后来者。因为罗马人和希腊人都希望自己属于与“蛮族”相对的“文明世界”,而罗马——较希腊人尤甚——认为,有的民族能够摆脱“野蛮状态”,他们的文明界限不是由地理方面的考虑决定的,而是由他们的生活方式固有的特点决定的,这就是要有城市、道路、行政官员、法律力量、固定的农业^②。很显然,希腊与罗马当时虽拥有民主制度,但它们自己也不认为这些东西属于文明的内涵,也没有把民主政体列为文明的特征之一,更不要说将民主作为文明的唯一标准了,何况希望成为文明社会恰恰说明它们尚不是当时所普遍认可的文明社会。

虽然拥有民主,却并不具有文明,而他们所羡慕的种种特点恰恰是东方文明所拥有的专制政体的内涵。难道文明不是民主,竟是人人痛恨的专制?

确实,在人类的大多数文明社会历史中,文明的要件不是民主,而恰恰是专制的政体。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在于所有这些文明制度在实现种群生存目标过程中的效率差异,是效率的优势决定了文明制度的内涵。对于人类历史上的文明社会,尽管不可能有一个定论,但多数的学者都同意某些共同的标准,比如定居、识字和城市的出现,比如米勒的文化六方面——技术、经济方式、政体、社会阶层结构、法律与价值体系,比如森哈斯的文明六边形——国家垄断权力、法制、民主参与、协调矛盾的文化、社会公正和感情控制^③。然而,不管是以定居、识字和城市为标志,还是以文化宗教为标识,文明肯定是公共经济制度变迁与效率提高的产物,文明肯定是早就存在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文明的本质是独立的、实现了专业化分工的公共经济体制。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人类公共需求内涵的变化,公共经济体制的方式可能发生变化,但独立有效的公共经济体制的出现与发展正是人类文明的表现。因此,正如摩尔根(1877)早就表明的那样,发源于17、18世纪英国的近代工业革命不可能是人类文明的起点。

其实,在人类一万多年的社会发展历史中,长期以来他们孜孜以求的文明制度的目标一直就是为了实现公共经济分工中产生的效率提高。而在人类早期的大多数发展过程中,种群生存始终是人类唯一的经济活动目标。正是在这种前提下,人类的祖先在不同的时空条件进行了反复的试验,最后得出结论:对于种群生存的目标来说,民主体制远不如专制政体更为有效。实际上,对于远古时期的人类来说,由于脱离了集体的生存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文明与发展的唯一含义就是种群的生存与壮大。今天被全世界津津乐道的所谓文明古国无一不是在种群生存竞争中获胜的民族,而种群生存恰恰是人类追求的第一个公共产品,也是人类第一个有意识存在的、主动追求的经济活动,这个经济活动的效

① 摩尔根,亨利·路易斯:《古代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

② 加亚尔·德尼兹:《欧洲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

③ 哈拉尔德·米勒:《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

率决定了该种群能否生存下去被历史所记录、能否发展壮大并成为一个文明古国。

米勒^①在批评亨廷顿过于狭窄的文明内涵时正确地指出:“动物依靠自己的本能努力生存下去,而人类在生物性的直觉方面确实不太灵敏。于是他们用‘文明的仪器’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主要的表现是‘集体概念’的产生。”“它大体是指社会分工的形式,诸如统治方式、抗御外界危险的安全措施、平息争端的方法、如何组织年轻一代参加某种社会活动等等——如果一个社会团体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准备好所有这些条件。”很显然,所有这些活动正是为追求种群生存所进行的公共经济活动,也是人类社会早期最为主要的经济活动,因此对有效率的公共经济组织形式的探讨就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史及思想学说史的主要内容与追求目标。确保种群生存既要解决对外防御问题,也要解决对内秩序问题。而在社会大分工的基础上解决这些问题,就是文明的内涵,因为只有效率因分工提高了,种群才可以扩大并延续下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认为农耕文明是人类第一个普世文明,专制的集权统治是人类第一个文明的政治体制。

正是为了追求这样的文明,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政治家才会百折不挠地进行反复的政治改革,放弃原有的原始部落民主,实行权威的贵族专制政体,并迅速进入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文明社会。但在其他更为古老、更为成功的文明中,人类文明的演变过程已经很难在文献典籍中找到确凿的证据,因此人类文明的脚印只能在神话传说与北美印第安人的失败教训中找到蛛丝马迹。

由于神话传说生动地折射出史前文化部族发展的历史,是原始人日常生活经验事实的反映,主宰一切的神灵明显带有人类部落首领的特定性格,因此用神话来研究史前人类的思想与历史发展本身就是一门科学^②。正如美国学者利明·戴维^③所说,“许多神话事件显然是以历史为依据的”,因此“一般地说,神话的确有助于人们解释古人的习俗、信仰、制度”。因为几乎所有的原始信仰都首先是由于对神灵的超自然的神力崇拜和畏惧而产生的,它们都试图通过原始的祈祷仪式从神灵处获得生命保护之类的公共产品。中原神话中那些创世造人的大神无不对华夏民族的种群生存这个最根本的公共经济活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对龙的图腾与崇拜不仅有对强制性权威的祈求,也有对自然条件控制的奢望。各个神话对炎黄、宙斯的崇拜同样体现了对公共经济制度发展所需要的权威、能力、道德的呼吁,而神话仪式的历史化,正是世俗君主对神话人物权威的巧妙利用。当然,无论是中原神话中的女娲,还是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抑或是中国哈尼族神话中的阿扎,这些神话中的英雄无一不是为了民族的共同利益而舍生取义,对他们的崇敬正是对公共经济利益与集体主义精神的肯定与追求。到后来,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专制权威正是以这些神话崇拜为基础的。正如人类文化学专家所说,社会状况的落后,思维形式的不发达,使得这些公共产品或社会秩序的提供手段也相当原始,文化与精神成为主要的强制力与执行保证。在原始社会中,神话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统一体,对于社会秩序的提供具有

① 哈拉尔德·米勒:《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

②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

③ 利明·戴维:《神话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绝对权威的作用,并且随着神话的叙述与解释权归统治者所垄断,世俗的专制政权逐渐形成了,文明也就出现了^①。

希腊、罗马在农耕文明出现过程中的相对落后也正是标榜为希腊、罗马文明复兴的现代文明几乎遭到了所有已有古老文明抵制的真正原因。一个落后的、被自己所反复抛弃的民主政治制度如何会是先进文明的代表?已经被许多民族反复尝试过的伟大的、古老的文明政治体制如何会落后了呢?思维深处的疑问一直阻碍着古老的四大文明(中国、印度、埃及与中东的文明)、甚至是六大文明(再把希腊与罗马的文明包括进来)在现代化中追赶的脚步。

或许米勒的看法是切中要害的:“西方从文化的启蒙时期开始进入现代主义,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功震撼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所有同时代的文化都是与这种宏伟的、历时几世纪之久的现代化过程进行‘争辩’的产物。反对这种进程,梦想回到真正‘黄金时代’的尝试,是所有倒退思潮具有的基本特点。”^②确实,英国、美国是从文明前状直接进入了工业文明,它们的文明内涵不仅与农耕文明没有任何联系,而且与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民主政治也几乎没有任何瓜葛。意大利的罗马文化与希腊的古老文化像东方古老的文明遗产一样,不仅必须在与这种工业文明的“争辩”中实现现代化,而且也曾经因对现代文明不屑一顾而在犹豫与反思中落伍。

因此,尽管在与现代工业文明的比较中处于下风,但传统的农耕文明与现代的工业文明一样都是文明的一种形态,并且是更为原本、更为原创的文明。它们都是文明,因为它们都用某一种政治体制成功地解决了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的同一个问题,即公共经济的效率提升问题。它们是不同的文明,因为它们面临的背景与条件互不相同,它们的解决方案互不相同。很显然,文明要解决的问题具有时空上的普适性,不同的文明只是不同的方案与体制尝试,并且若以公共经济制度的出现或改进为标志,人类文明是以定居农耕文明为起点的,工业文明仅仅是一次新的文明转换,是公共经济体制的一次变迁。

因此,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所要分析的问题是人类的文明问题,即公共经济体制本身的问题,而不是公共经济所要追求的公共产品或公共利益的分配问题,那么在现实国际局势中就既不会有文明的冲突问题,也不会有文明的共存问题,我们真正想追求的是文明的变迁。因为一旦新的更有效率的公共经济体制出现了,所有的民族都会愿意选择这个新体制的。在这一点上,不管是已变迁成功的发达国家、还是尚未变迁的不发达国家之间并不会有大的分歧。至于在这个变迁的过程中涉及的内部的公共利益分配与国家之间的公共利益竞争问题,仅仅是利益的分配,与文明变迁的本质并不相关,但这些内部的政治斗争与外部的国际关系肯定会影响作为政治体制变革结果的文明变迁的进程快慢。

正是这个原因,我们不认为“18世纪以后的世界历史,就是西方怎样把自己的文化影响强加于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尽管“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各种器物 and 所遵循的各种

^① 张振犁,陈江风:《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

^② 哈拉尔德·米勒:《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

制度”几乎都是“源于西方”^①。因为实际的进程很可能是这样：欧洲大陆国家从英国抄袭来一个公共经济制度与重商主义体系以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然后再像英国人那样把斯密教条与市场经济制度推向全球，而并没有舍得把公共经济制度与重商主义推向全球。发达国家在公共经济制度与现代政治文化传播方面的保守在英国表现得最为典型，因为英国连当年的北美殖民地都不愿意强加这样一个先进的公共经济制度，甚至还试图用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欺骗当时的追随者。因此，如果有所谓的文化强加，可能也只是落后的基督教文化试图搭车来狐假虎威并展示其落伍的传统文化，而与真正的现代文明变迁与传播没有太多的关系。因为这些传统的文化没有一个是真正的近代工业或现代文明的内涵，因此在这种背景下，不仅引进“西方文化”没有成功并不为怪，而且在引进过程中的“文化溶血”现象也一点都不可怕。至于传统的文化体系与精神根基要不要被改造或替代，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共存没有太大的关系，有关系的是是否与现代文明体系要求相吻合。而面对这个要求，不仅传统的伊斯兰教、佛教、儒教文化要改造，而且基督教本身反复改造了许多遍。

当然，希腊、罗马由原始部落民主向贵族专制的变革过程和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宗教史告诉我们，这个改造过程是艰辛与痛苦的，因为“一个文明体系的精神根基是不可能轻易地被抛弃和被替代的，这种精神根基就是文明赖以维系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但我们也看到，这个痛苦的蜕变过程逃避或没有成功的民族，要么成了文明的活化石，像埃及与北美印第安人；要么被从肉体上消灭了，比如玛雅人与苏美尔人。

其实，在各个民族相互竞争的过程中，他们真正关心的公共利益主要是种群的生存问题，文化体系与精神根基只是服务于这个目的的手段。但一方面是对旧有成功方法的依恋，一方面是既得利益阶层的阻挠，传统文化体系往往被作为目标本身来与新的方法体系相对立。更何况，各个民族的生存问题正是最为重要的公共经济对象之一，或者是主要的公共利益之一。虽然工业文明的繁荣已有了近二百年的历史，但因为人类仍然被生存的危险所困扰^②，旧的体系在一定的范围内还能够苟延残喘，因此有利于人类文明变迁的政治制度并不能轻而易举地被建立起来，无论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传统文明中虽不利于效率提高，但却有利于种群生存的旧原则与旧机制仍在发挥作用，并阻碍着现代文明的扩散与推广。

不了解文明的这些特征与文明目标的普世性，亨廷顿却借助于奈保尔之口，强调了普世文明在当代的出现，并强调普世文明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即西方文明的普遍适用性。这种以西方文明、特别是以基督教文化为基础的文明为普世文明的做法当然受到了其他文明的反对。因为即使西方是第一个现代文明，也不能因此就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就是普世文明。因为在西方文明出现之前，普世的专制帝国文明早就存在了几千年，现代文明不可能是第一个普世文明。

关于西方文明或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区别，米勒的认识是非常到位的。他强调，这

① 赵林：《告别洪荒——人类文明的演变》。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② 哈拉德·米勒：《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